

晚清天津民間醫士的防疫與宣傳活動 ——以「鐵如意軒」及「敬慎醫室」為例

鄭永昌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提 要

晚清光緒後期，天津地區曾先後經歷霍亂與鼠疫的威脅，由於地方民眾缺乏個人衛生習慣與外在環境寒暑變化不定等因素，疫病傳染快速並造成嚴重人口死亡，加上國家政府財政困難，外國勢力對地方衛生的干涉，促使天津地區在地社會士紳紛紛投入防疫與衛生宣導等活動。就目前資料所見，當地醫士徐延祚開設的「鐵如意軒」以及丁國瑞所設之「敬慎醫室」兩者留下了較為豐富的紀錄，從中可以反映晚清天津地區人民面對災疫肆虐的威脅下，地方士紳在重建社會、教育人民與保衛地方醫療主權過程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共計三節，首先針對晚清天津地區分別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霍亂大流行與宣統二年（1910）底爆發的鼠疫，探討清末天津地區瘟疫對社會的影響情形；其次透過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天津地區發行的報紙、方志文獻與文集筆記等資料，分別介紹此兩次災疫過程中，徐延祚與丁國瑞兩人的個人背景與行醫經歷；最後藉由兩位醫士投入防疫與宣導教育活動過程，了解天津地區在國家與社會，中醫與西醫、清政府與列強各種複雜關係中，地方醫士推動防疫活動的重要內容與面對的難題。

關鍵詞：晚清、天津、醫士、徐延祚、丁國瑞、鐵如意軒、敬慎醫室、防疫、霍亂、鼠疫

前 言

本文主要以晚清最後十年（1902-1911）天津地區爆發的兩場瘟疫，當地兩位中醫人士為線索，以微觀視角，觀察清末天津地區面對疾病威脅，地方菁英作出的對應，並從中了解當時身處於時代變動，政制革新以及中外競爭勢力磨合的洪流中，中國傳統醫士如何發揮其防疫、治疫的社會責任，進而推動地方衛生教育，並試圖重建中醫形象的過程。

天津，作為京師的門戶，人口流通頻繁，又自清末開埠以來，中西商賈匯聚，逐漸成為北方重要通商口岸。清末士人張燾在他所寫的《津門雜記》具體描述天津在當時在政治、經濟與交通上的重要地位：

嘗考津門為畿輔喉襟之地，人雜五方，繁華奢侈，習俗使然。……自西洋通款，各國來津貿易者既夥，議准於距城五里之紫竹林地方設立關權，建造房屋。中外互市，華洋錯處，輪艘懋遷，別開生面，為北洋通商要地。¹

作為「北洋通商要地」、「地當九河津要」²的天津地區，由於交通發達，人口密集，經由鐵路、運河與海路連結起周邊城鎮與港口；然而，清末天津外部的優勢條件，卻未能為內部創造最佳的居住環境。光緒二十四年（1898）曾北上路經天津的王錫彤（1865-1938）描述當時目睹情形：

天津為北方諸河入海總匯處，海通而後，各國輪船往來如織。土產運出，洋貨輸入，大交易場肆殷闐，冠絕一時。惟房屋之低矮，道路之污穢，殊出情理之外。沿河兩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張目。³

由此可知，天津作為華北地區的「商務中心」，由於其交通發達，人口流動，但城市衛生環境惡劣，當重要疫情發生之際，將加速其傳播與擴散的速度，造成大量人口感染而死亡。本文所要探討的時點，即是清末十年間天津地區爆發的兩場嚴重瘟疫，一次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天津的霍亂大流行；另一次是在宣統二、三年間（1910-1911）源於東北隨後傳播至天津的肺鼠疫傳染。

面對這兩場瘟疫的威脅，上自地方政府，下至社會團體，皆投身參與防疫治疫

1（清）張燾，《津門雜記》，〈自序〉，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三編》（臺北：臺新文豐出版社，1997），冊73，頁541。

2（清）張燾，《津門雜記》，卷上，〈考略〉，頁545。

3（清）王錫彤撰，鄭永福、呂美頤點注，《抑齋自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6。

的工作。⁴ 本文另一個討論重點，即以當時在天津地區開設「鐵如意軒」的徐延祚（約 1840 年代-1917）⁵ 與「敬慎醫室」的回族醫士丁國瑞（約 1869-1935）⁶ 為例，了解當時民間人士對這兩場瘟疫的態度與參與情況。

從現有文獻資料顯示，兩人雖未謀面，但兩人中醫出身背景，在參與防疫活動上卻有許多相近之處。更有趣的是，兩人皆同時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離開北京，後輾轉來到天津行醫，而又同時在宣統三年（1911）初，徐氏離開天津返京，正式結束天津多年的生活，而丁氏則由於個人因素開始淡出社會活動。清末十年，天津地區的社會變革，瘟疫帶來的社會變動，提供了兩位中國醫士投身參與的舞臺。以往學者有關徐、丁兩人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個人傳記式的探討，或多偏向於其人對時事與教育的主張，⁷ 又或著重對兩人醫學論著的考證。⁸ 前人學者的研究成果，提供筆者撰寫本文許多重要參考線索，然綜觀諸文，較少從其兩人作為中醫出

- 4 張海榮，〈清末天津衛生事業的發展與市民衛生觀的初步確立——以《大公報》為中心的考察〉，《城市史研究》，2014 年 2 期，頁 52-72。
- 5 有關徐氏出生年份，曹瑛，〈清末遼寧籍醫家徐延祚及其醫學貢獻〉，《中醫文獻雜誌》，2010 年 3 期，頁 46 認為是在 1830 至 40 年代間；而朱鵬舉、傅海燕、趙明山等人在〈清末民初醫家徐延祚其人其書考〉，《浙江中醫雜誌》，2016 年 3 月 51 卷 3 期，頁 218 則據徐氏行醫活動推算應不早於 1840 至 50 年代，更合理是在 1840 年代。本文採用朱鵬舉文章觀點。
- 6 關於丁國瑞生卒時間學者間有不同看法。生年方面戶部健，〈北洋新政時期天津中醫界的改革活動與地域社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7 年 8 期，頁 150 認為丁氏生於 1869 或 1870 年；鄧華，〈對丁竹園教育思想的認識〉，《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15 年 2 月 31 卷 1 期，頁 87 主張是 1869 年；張琴，〈秉承家學·懸壺濟世——記我國近代回族著名醫師丁竹園〉，《中國穆斯林》，2010 年 2 期，頁 56，以及楊志平，〈近代回族報刊對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及其影響〉，《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9 年 4 期，頁 82 兩文，則提出在 1872 年。至去世時間，楊志平認為是 1932 年，張琴主張 1934 年，鄧華則稍晚的 1935 年。
- 7 有關徐氏的研究，可參呂凌，〈清代遼寧地區代表性醫家考略〉，《中醫文獻雜誌》，2017 年 2 期，頁 46-51；而丁國瑞的討論部份論著相對較多，其中又以張琴等人較具代表性，見張琴，〈秉承家學 懸壺濟世——記我國近代回族著名醫師丁竹園〉，頁 56-57；張琴、馬志俊，〈近代回族社會活動家丁竹園及其禁煙活動述略〉，《蘭臺世界》，2012 年 33 期，頁 80-81；張琴、王晶，〈近代回族報人丁竹園的職業觀及其社會實踐研究〉，《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2 年 3 月第 27 卷 2 期，頁 79-82；張琴、馬志俊，〈論近代回族社會活動家與民間禁煙運動——丁竹園及其組織化禁煙活動探析〉，《石河子大學學報》，2016 年 12 月 26 卷 6 期，頁 108-112；張琴，〈晚清回族知識份子丁竹園愛國主義思想評議〉，《民族藝林》2014 年 1 期，頁 48-52；其他相關論著有許憲隆，〈丁竹園愛國民主思想初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 年 3 期，頁 54-57；楊志平，〈近代回族報刊對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及其影響〉，頁 81-87；鍾銀梅，〈救濟蒼生·矢志不渝——丁竹園濟世救亡理念探析〉，《回族研究》，2011 年 2 期，頁 80-86；鄧華，〈對丁竹園教育思想的認識〉，頁 87-93。
- 8 如曹瑛，〈清末遼寧籍醫家徐延祚及其醫學貢獻〉，頁 46-48；王全利，〈《醫醫瑣言》價值再評價〉，《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14 年 5 月 38 卷 3 期，頁 252-253；朱鵬舉、傅海燕、趙明山，〈《醫粹精言》文獻學初考〉，《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16 年 2 月 22 卷 2 期，頁 160-162、173；朱鵬舉、傅海燕、趙明山，〈清末民初醫家徐延祚其人其書考〉，《浙江中醫雜誌》，2016 年 3 月 51 卷 3 期，頁 218-220；丁國瑞的討論見丁宏，〈丁竹園與《竹園叢話》〉，《回族研究》，1991 年 4 期，頁 78-81。

身的背景，其以醫救人，以醫濟世的情懷，結合社會活動進行整體性分析。⁹ 本文嘗試從時、地、人三方面，討論他們在晚清十年，在天津地區，兩位醫士為線索，論述他們在兩場大瘟疫的過程中，如何致力啟發民智，提倡公共衛生教育以及爭取中醫權益活動上的努力。

全文除前言、結論外計分三章，首先討論清末十年前後天津地區先後發生的霍亂大流行與東北肺鼠疫傳播對天津地區的影響；以此為背景，次章扼要簡介徐、丁兩氏個人經歷，以了解其主要行醫活動情況；最後討論兩人在兩場瘟疫爆發過程中，致力以醫濟世的使命及最終結局。為了較全面審視兩氏的活動情形，一方面廣泛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外，亦將仔細爬梳兩氏存世的醫學著作及報章專欄，並結合相關檔案文獻、文集筆記、日記與報章報導等，藉以具體勾勒出清末十年間兩氏參與防疫活動的整體面貌。

一、兩場瘟疫

清朝（1644-1911）統治中國的268年間，據統計疫年217年，大疫114年，平均1.2年就有一次疫情的紀錄。¹⁰ 而清代中葉以後，由於中西交通大開，疫情頻發的次數更甚於以往。清末十年，天津地區先後發生了兩場嚴重瘟疫，一次在光緒二十八年的霍亂大流行，另一次是宣統二、三年間源於東北繼而傳播至天津的肺鼠疫傳染。此兩場瘟疫，光緒二十八年的霍亂，如單麗研究指出：「在中國古典霍亂（Cholera）流行史上，光緒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是一個極為重要年份。其中就北方地區而言，京津為中心的直隸地區、營口為中心的奉天省地區、以及冀魯省際交接地帶霍亂疫情尤為嚴重。」¹¹

9 其他專題分析中涉及丁國瑞的文章，有路彩霞，〈中醫存廢問題第一次大論爭——清末天津中醫與《大公報》筆戰事件考察〉，文中主要討論宣統三年初東北鼠疫爆發丁國瑞與《大公報》就中醫存廢問題的一場論戰，該文收入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與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216-233；又戶部健，〈北洋新政時期天津中醫界的改革活動與地域社會〉，頁149-162，全文主要以丁國瑞創辦的「醫學研究會」為探討重心，分析該會在改革晚清中醫界方面的努力；另羅芙芸（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一書第八章則對丁國瑞面對天津醫學界重西醫輕重中醫提出抵制的行動作了具體的描述，見羅芙芸，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259-264。

10 李文波編，《中國傳染病史料》（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頁18。

11 單麗，〈從1902年霍亂傳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10月26卷4輯，頁55。

而身處於清末宣統年間的李廣誠，以他親身經歷對當時北方鼠疫傳播所造成社會上人心惶惶無疑是「中國北方莫大的浩劫。」¹²

（一）光緒二十八年的霍亂大流行

霍亂，俗名黑螺痧，又名子午痧、癘螺痧、吊腳痧，係由霍亂弧菌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以吐、瀉、抽筋、脈絕、身涼、音啞、目吊為典型病徵。傳播速度快，死亡率高。¹³ 此年天津出現的霍亂大流行，學者研究皆指出它是境外傳入，¹⁴ 並且集中於沿海開埠的港口。¹⁵ 當年剛開辦的《大公報》更是對此次瘟疫進行了大幅的報導。¹⁶ 據載：五月間，始見於塘沽，繼見於天津市區。隨後分路傳染，向北、西、南三個方向呈扇形擴散，傳至京師等地，並於六月進入高峰期。¹⁷

然而，從當年京津一帶長期乾旱，氣溫冷熱起伏不定，加上城市居民欠缺衛生觀念，街道骯髒，無疑更是助長霍亂傳播感染的關鍵因素。據《大公報》報導：

是年由春入夏，直隸、京師一帶氣候異常。直隸境內數月亢旱，津郡入夏以來，天久不雨，暑熱燥烈之氣，由上而下，濁穢之氣，自下而上。人處其中，或遭穢濁薰蒸，加以天時之忽冷忽熱，食品之半生半冷，寒暑雜糅於中，正不能堪，故三焦溷濁，清濁相干，遂成霍亂。¹⁸

路彩霞研究指出，乾旱是光緒二十八年助長多數省份霍亂流行的氣候背景，正是時人所稱「時令不正致疫」的原因。¹⁹ 由於氣後乾旱不雨，在自來水尚未普遍的時代中，地方居民或販夫走卒隨意飲用未經煮沸或過濾清潔的生水，若水源被霍亂弧菌污染，疫症隨之傳播擴散。²⁰ 由此觀之，光緒二十八年天津霍亂的流行，是由於氣

12 李廣誠，〈撲滅中國北方之瘟疫〉，《東方雜誌》，8卷8號，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頁4。

13 岳謙厚、喬傲龍、劉紅彥，〈清光緒二十八年天津霍亂防治——《大公報》有關此次疫情及防疫報導之研究〉，《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6期，頁49；程龍，〈《大公報》1902年瘟疫報導研究分析〉，《東南傳媒》，2008年1期，頁86。

14 羅芙芸，〈衛生的現代性〉，頁192。

15 單麗，〈1902年中國南方霍亂的海路港口傳入與內陸蔓延〉，《國家航海》，2012年1期，頁46-47。

16 馮志陽，〈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衛生觀念——以《大公報》對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史林》，2006年6期，頁96。

17 〈中外近事·本埠〉，《大公報》（天津，1902年7月9日）。

18 〈廣告〉《大公報》（天津，1902年6月24日）。

19 路彩霞，〈年中度歲與晚清避疫——以光緒二十八年為主的考察〉，《史林》，2008年5期，頁91。

20 路彩霞，〈年中度歲與晚清避疫——以光緒二十八年為主的考察〉，頁91-93。文中即提到當時日本醫生鈴木發現天津霍亂是人民飲用了被霍亂弧菌污染的海河水所引發的結果。

候不正、供水污染、衛生設備不足綜合導致的結果。²¹

隨著疫情的發展，死亡人數的攀升，直接造成天津居民生活與心理的衝擊。²²當時居住在天津河北三條石玉泰棧的醫士朱玉振，在《大公報》一則廣告中描述了對這場霍亂流行的心情：「振業醫三十餘年，未見今夏之瘟疫如此之重。一得吐瀉轉筋，手足發烏冰冷，頭出涼汗，肚腹大熱，朝不保夕，良可慨也。」²³廣告內他提供了一帖〈治疫藥方〉，供民眾參考服用；另一則同樣來自《大公報》的專欄，作者張志曾也指出這次瘟疫導致大眾心生畏懼的情形：「今春入夏以來，患霍亂痧症者各省皆有。其症較往年尤甚，每多朝發夕死，令人生畏。」²⁴

面對這次霍亂疫情，當時天津地區尚在外國聯軍控制之下組成「都統衙門」管理，乃率先組成「瘟疫防治局」，處理防疫與治疫的工作。²⁵至津郡紳商等也起來號召，糾同該埠眾商買辦集資籌建防疫醫院，其中在《大公報》所載分別有津商孫仲英與天津商務總會協理甯世福（字星普）合資建蓋的「臨時保衛醫院」²⁶與河東地區紳商在同吉順籌建之「施捨醫藥院」。²⁷其中尤以「臨時保衛醫院」最為著名，報導篇幅也較多。據報載此醫院：「天津時疫流行，死亡相繼。南清紳商孫仲英君惻隱為懷，首先邀集同志甯馨圃（即甯星普）等創設保衛醫院十一所，現已開辦者五所。」²⁸這些以地方紳商開設的醫院，不僅在協助防疫治疫，以至宣導防疫衛生知識發揮相當貢獻；另外對紓緩官方人力與經費不足困境上，亦提供不少幫助。²⁹

事實上，此次霍亂大流行防疫工作中，由於天津仍處於西方列強管轄區域，租界洋捕洋醫往往為貫徹治疫政策，對於染疫或懷疑感染時疫的華人施以粗暴對

21 程愷禮 (Kerrie L. MacPherson), 〈霍亂在中國 (1820-1930): 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 收入劉翠溶、伊懋可主編, 《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1995), 下冊, 頁 750。

22 〈紀保衛醫院〉, 《大公報》(天津, 1902年6月18日)。據載當時「津郡時疫流行, 傳染甚速」。由此可見疫情蔓延的快速程度。

23 〈廣告〉, 《大公報》(天津, 1902年6月22日)。

24 〈用痧藥宜先辨痧症說〉, 《大公報》(天津, 1902年8月19日)。

25 羅芙芸, 《衛生的現代性》, 頁 192。

26 〈添設醫院〉, 《大公報》(天津, 1902年7月1日)。

27 〈紀保衛醫院〉, 《大公報》(天津, 1902年6月18日)。

28 〈見義勇為〉, 《大公報》(天津, 1902年6月21日)。

29 岳謙厚、喬傲龍、劉紅彥, 〈清光緒二十八年天津霍亂防治——《大公報》有關此次疫情及防疫報導之研究〉, 頁 52; 張海榮, 〈清末天津衛生事業的發展與市民衛生觀的初步確立——以《大公報》為中心的考察〉, 頁 68。

待、闖屋擾民事件也時有所聞。例如《大公報》載「天津防役過嚴，留難病人」³⁰；同日又載「河東德界洋捕不時按戶搜索，凡鎖閉之空房與院中堆積之物件，或牆隅屋角，無不一一驗看，住戶人等不勝疑懼。」³¹類似事件在上海亦復發生，甚至驚動朝廷，光緒二十八年七月間皇帝即由軍機處向南北洋大臣發佈了一道上諭，要求地方大員研議改善地方防疫之道，以存民命。經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1859-1916）妥善籌劃，據奏稱：

查北洋為通商巨埠，商旅雲集，輪舶往來，帆檣相望。海口驗疫向未專設醫院，僅由津海關飭派華醫隨同查驗，一切章程辦法，皆由外人主持。……迨至亂後（即庚子拳亂），則統由聯軍派西醫管理，華官更無從過問。……即擬變通辦法，收回事權，……參酌西方防疫之法，釐訂章程，……凡遇輪舶民船進口，均由醫生就船診視。中國商民悉歸華醫自驗，遇洋人則驗以洋醫。行旅絲毫無擾，辦理漸次順手。³²

從奏摺內容來看，袁世凱奏覆主要是針對港口驗疫防疫方法，但津郡地方華人因外人查疫防疫頻受滋擾，官方也無能為力。因此，當地商紳為華人興建防疫醫院就顯得格外重要，其順應民情的治療方式，在防疫抗疫過程中對保護地方華人發揮重要效果。對此，《大公報》也給予肯定的報導：

本埠創辦保衛醫院，屢記報章。茲聞保衛總局及集賢院、浙江會館、文昌宮、府署內侯家後、女醫院內各分局共六處，業經開辦施治。每院各有華醫診疾，日來貧寒士民之赴院求診者，紛紛不絕。創辦諸君之盛德，洵堪不朽也。³³

隨著氣候轉涼，疫症本身高峰週期衰竭以及地方官紳共同努力等因素，天津霍亂疫情逐次消滅。自五月底疫情爆發，六月達到高峰，七月以後開始衰退，延至十月間，有關疫情的報導也漸見止息。據紀錄，光緒二十八年天津霍亂大流行，其高峰期的六、七月間，患疫者 738 人，疫亡 620 人，經治愈的 78 人，仍在醫院調治的 40 人。³⁴染疫病人痊愈者不過僅佔十分之一，時官方報導口稱存活甚眾不過是誇飾

30 〈謠言不確〉，《大公報》（天津，1902 年 6 月 23 日）。

31 〈德捕查疫〉，《大公報》（天津，1902 年 6 月 23 日）。

32 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為北洋遵旨妥籌驗疫辦法謹陳詳細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文獻編號 408001410，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3 〈開院施醫〉，《大公報》（天津，1902 年 6 月 24 日）。

34 〈譯件〉，《大公報》（天津，1902 年 7 月）；另參單麗，〈1902 年霍亂在中國的流行〉（山東：中

之詞，但也確實反映出此次瘟疫流行的兇猛程度。

(二) 宣統二、三年的肺鼠疫傳播

鼠疫病症有三種類型：第一是腺鼠疫，是鼠疫中最為常見，嚙齒類動物藉由跳蚤叮咬傳播到人類身上，導致人體淋巴結發炎和組織腫脹，感患後不及時治療，約3至5天將因心臟衰竭或引發敗血症或肺炎死亡；第二類是肺鼠疫，宣統二、三年間東北地區爆發的鼠疫即屬肺鼠疫，又稱「百斯篤」。感染者直接來自人與人之接觸，經噴嚏或咳嗽飛沫傳染。病狀為大熱、頭痛、暈眩、倦怠、咳嗽、吐血、眼球結膜充血，其股腺、腋下腺與頸腺等處腫脹，最終出現心臟麻痺，精神朦朧及虛脫而死亡。由於肺鼠疫以呼吸困難和缺氧致皮膚青紫為典型表現，故又稱為「黑死病」，發病3至4小時內死亡；第三是敗血症鼠疫，多屬腺鼠疫繼發，是血液受感染，3至4天內死亡。³⁵

宣統二、三年間東北地區爆發的肺鼠疫，被稱為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鼠疫大流行，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一次嚴重瘟疫。³⁶ 其傳播速度之快，死亡率高，被列為烈性傳染病之一。引發這場鼠疫流行的原因，是來自俄屬西伯利亞、蒙古、北滿草原帶有鼠疫桿菌的旱獭，被前往東北的獵人捕獵後感染，隨著當地外來勞動人口的移動，疫情遂迅速擴散開來。³⁷

1910年10月中旬，東北黑龍江西部緊鄰俄國邊界的滿洲里地區，發現首例鼠疫病患，10至12月間，疫情開始蔓延至哈爾濱、吉林、長春、甚至奉天等地。1911年1月，疫情南下，擴散至大連，隨後山東以及京津地區開始出現首例病患。³⁸ 事實上，所謂滿洲里首例疫患出現前，1910年9月中旬，俄屬西伯利亞達烏里亞地方已發現有感冒情形，但因既處邊外，又事屬零星，未為中國當局注意，及

國海洋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41-42。

35 《盛京時報》，〈奉天省城警務局關於防疫之告示〉，1911年1月11日，轉引自王銀，〈1910-1911年東北鼠疫及防治研究〉（江蘇：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5），頁1；費克光（Carney T. Fisher），〈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收入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下冊，頁674；Cora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

36 Sean Hsiang-lin Lei (雷祥麟),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42.

37 王銀，〈1910-1911年東北鼠疫及防治研究〉，頁1；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流行——上海、東北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02-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1期（2006.3），頁92。

38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頁138、157。

至首例病患在中國境內發現，引起地方官員關注，雖即時將鐵路關閉，但已無法阻止疫情擴散。³⁹時東三省總督錫良（1853-1917）奏報即指出：

查此次百斯篤之疫，實始於滿洲里左近。由哈爾濱、長春蔓延於黑龍江、吉林、奉天，迨京奉、東清、南滿火車停開，遮斷交通，而疫勢已如江河，一瀉千里，不可遏絕。⁴⁰

從以往中國滿蒙地區出現過的鼠疫案例來看，大多屬零星事件，而當地土著居民從生活經驗中，也知道如何防疫或避疫方式。然而，二十世紀初期，隨著東北旱獺毛皮在世界市場廣受歡迎，尤其西歐地區數年間毛皮市場價格飆漲至六倍之多，甚至出現供不應求之勢，因此吸引了大批外地獵人前往捕抓旱獺。但這些外來獵人並不孰悉患病旱獺與健康旱獺之分，在追求利潤心態驅使下，輕易即可捕獲的病獺，經由人與動物、人與人之間，成為鼠疫大規模傳播的途徑。⁴¹

此外，晚近學者認為，東北肺鼠疫傳播速度如此之快，短短數月間從一個滿洲里地方迅速擴散至東三省，並南下蔓延至山東與京津一帶，大量勞動人口的移動，區間貿易的成長，商貿經濟的發展，更重要是東北鐵路運輸網在十九世紀晚期次第興建後助長了鼠疫傳播的威力與速度。中東、南滿、安奉、京奉等鐵路，在二十世紀初期呈鋪天蓋地席捲了沿線各城市。⁴²以奉天省營口為例，「火車兩日可達津門」。⁴³當時一名中國記者報導了中國政府聯合各國代表，在東北召開了一場盛大的防疫會議，引述了會上中國代表的發言：

直隸代表一名醫官霞乃卜稱，天津疫症之發生，乃由一商人自哈爾濱歸，遂致傳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亦稱，疫氣蔓延之各城鎮，均沿近鐵路交通之線。⁴⁴

39 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 138；王銀，〈1910-1911 年東北鼠疫及防治研究〉，頁 10-11。

40 錫良，〈東三省疫氣一律撲滅在事尤為出力人員請獎摺〉，宣統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冊 2，奏稿，卷 7，頁 1311。

41 費克光（Carney T. Fisher），〈中國歷史上的鼠疫〉，頁 717；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流行——上海、東北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02-1932）〉，頁 99-100；Cora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155-156.

42 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流行——上海、東北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02-1932）〉，頁 104-105。

43 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為北洋遵旨籌辦防疫在事華洋各員異常出力謹擇尤酌擬獎敘事〉，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文獻編號 408001529，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4 杜山佳，〈萬國防疫會記〉，《東方雜誌》，8 卷 3 號，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頁 21。

天津位處南北交通樞紐，來自滿洲主要鐵路匯聚於天津，而從滿洲港口向南航線開行亦停靠大沽，天津在這場鼠疫傳播中勢難全身而退。⁴⁵ 疫情傳播之速，影響範圍之廣，引用當時「萬國防疫會」會長伍連德（1879-1960）形容的說法：「如疾風迅雨下南滿而至山東、直隸等省。」⁴⁶ 其所造成社會民眾的惶恐與不安，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述當時社會民眾心態：「疫氣所至，朝發夕斃，前仆後繼。官紳商民，無中外貴賤，日惴惴焉如臨大敵。」⁴⁷

據《大公報》報導，天津在宣統二年十二月中旬，位於奧國租界內出現一名劉姓市民的首例鼠疫患者。⁴⁸ 報導中並未具體指出該市民是否即「萬國防疫會」上所稱來自哈爾濱的商人，但地方當局隨即設立「臨時防疫會」，而以天津總商會為主的紳商人士，於宣統三年正月間開辦「防疫保衛醫院」，共同投入防疫查疫與治療的行列。⁴⁹

綜觀這次東北肺鼠疫的發生，從 1910 年 9 月零星發生，至 10 月間中國境內出現首例病患，開始向南北各省蔓延，遍佈東三省及華北地區。據統計染疫身亡人數近六萬人。⁵⁰ 至於天津地區，從 1911 年 1 月間首例病患出現，直到 4 月中旬才漸得遏止。⁵¹ 在這次地方官民努力下，有效防堵疫情的增溫，⁵² 以下將以徐、丁兩位中醫士為例，以微觀的視角，進一步了解當時地方菁英參與防疫的過程。

二、兩位醫士

以往有關清末十年天津地區兩場瘟疫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官方防疫政策、中外

45 羅美芸，《衛生的現代性》，頁 281。

46 〈萬國防疫會會長伍連德演說詞〉，《盛京時報》（1911 年 4 月 8 日）。

47 錫良，〈疫氣蔓延人心危懼請俟事竣保獎出力人員摺〉，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收入《錫良遺稿》，冊 2，奏稿，卷七，頁 1265-1266；另 Sean Hsiang-lin Lei（雷祥麟），*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21-27 一文對當時東北鼠疫的特殊性也有深入的論析。

48 《大公報》（天津，1911 年 2 月 5 日）。

49 〈津商會為東三省鼠疫傳染津埠擬急立保衛醫院并按區設董嚴加訪查事稟直督文〉，宣統三年正月十六、十八日（1911 年 2 月 14、16 日），收入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下冊，頁 2164-2166。

50 胡勇，〈清末瘟疫與民眾心態〉，《史學月刊》，2003 年 10 期，頁 73。

51 〈棧房商十八家訴陳津地鼠疫已退請速示出口免驗以挽天津市面〉，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1911 年 4 月 14 日），收入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上冊，頁 906。

52 據李文波統計，1911 年初天津地區鼠疫感染死亡人數為 152 人。見氏著，《中國傳染病史料》，附表 11，〈1901-1949 年各省區鼠疫統計年表〉。

利權紛爭、或社會團體組織等方面，相對上較忽略個人行為在其中扮演角色。換言之，以往關注大政策或大組織的議題中，即使涉及個體，也不過是用來彰顯整體的動向，而對在大環境的變遷與面對社會危機的過程中，究竟個體本身作出了什麼活動，怎樣的調適，採取什麼策略與提出什麼想法，以往相關討論中相對被忽略。

本文即嘗試從清末十年兩位人物進行討論，從中折射出個人對社會環境變遷下的肆應。此兩位人物，徐延祚與丁國瑞，曾作為天津的市民，同時也是具有醫士的身份。兩人或許未曾謀面，但在整理兩人相關資料顯示時，將發現兩人皆來自北京，卻相同地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離開北京，繼後到天津展開生活；在天津生活期間，又同樣各自開設醫館行醫濟世；在面對瘟疫肆虐期間，同樣扮演了儒醫，發揮社會責任的角色。徐延祚在他編纂的《醫粹精言》一書中，曾引述清代乾嘉年間著名醫家陳修園（1766-1723）的話：

前輩云，醫人先當醫醫。以一醫而治千萬人，不過千萬人計耳；救一醫便救千萬人，救千萬人便救天下後世無量恒河沙數人耳。⁵³

而丁國瑞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一篇〈創議中醫研究會啟〉中也有類似的看法：

中國醫學，何由而頹廢？曰：不講而已。夫百工技術，尚待研究而後精，況與民命最有關係之醫學乎？……然活人之心易得，而活人之術甚不易言。……是醫者，當以惻隱存心，而尤以精研醫術為第一要義，……挽救乏術，爰約同志，設會研究，……不但岐黃之道統，繼續綿長，而此後之億萬病人，將必沾實惠而同登壽域矣。⁵⁴

徐延祚所說的醫醫，與丁國瑞主張的救醫，幾可謂異曲同工。將他們作歷史的串連，或許可以觀察個人在身處近代社會變動的一個另一縮影。

（一）當代扁倉：「鐵如意軒」徐延祚

《大公報》1910年5月15日刊登了一則由張勳帛、龔雨蒼等人領銜，以「鐵如意軒」為標題，將古代名醫扁鵲與淳于意來稱譽徐延祚，宣揚他醫術高明，濟世為

53（清）徐延祚，《醫粹精言》，收入陳建華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鐵如意軒刻本影印），冊366，輯44，子部醫家類，冊5，卷1，〈醫醫說〉，頁271（頁21b）。

54（清）丁國瑞，《竹園叢話》，收入吳海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民國十二年天津敬慎醫室鉛印本），政史類，冊120，第5集，〈創議中醫研究會啟〉，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頁119-120。

懷的抱負的廣告，反映出社會名士對徐延祚醫術的肯定。⁵⁵

徐延祚，字齡臣，奉天錦州府錦縣人。徐氏在三十歲開始行醫，先後曾以「半思堂」與「鐵如意軒」之名開設醫館，著有《醫粹精言》、《醫意腑臟圖說》、《醫意》與《醫醫瑣言》，其後彙輯取名《奉天徐氏鐵如意軒醫書四種》刊行問世。晚近學者就《醫粹精言》與《醫醫瑣言》兩書進行分析，發現書中內容除引錄自傳統中國醫書外，更有不少來自日本醫論。⁵⁶

早年因學而未第，遂棄儒學醫，同治、光緒間開始在京中行醫，設館取名「半思堂」。有趣的是，這間醫館，正位於軍機大臣翁同龢對門。⁵⁷ 由於徐氏醫學造詣甚佳，遂得以進入太醫院供職，⁵⁸ 並先後為光緒皇帝及朝中大臣診治，其中包括醇親王奕譞、官員紹彭、史支源、崔永安、楊錫霖等。在《翁同龢日記》中記述了徐延祚在朝廷供職期間診案數則，例如徐氏治愈了紹彭的失眠，被讚譽「一依仲景立法，非庸手也。」⁵⁹ 而替光緒帝診治，《日記》中紀錄：「上告余云，徐延祚不知何許人，服其藥手微能動。小建中湯加洋人所賣魚油。」⁶⁰ 至於記述醇親王奕譞治療中風病情經過，徐延祚雖向翁同龢莽撞自薦被罵斥為「狂誕人」，但經徐氏治療半個月後，醇親王病情確有好轉。《日記》載：「醇邸服徐延祚方，左腿略動轉」。然而，可能由於宮中御醫向慈禧太后進言徐氏藥方中使用鹿茸，似對醇親王病情有礙而被下旨禁用。翁同龢不禁在《日記》中，連用「奈何」兩詞深表嘆惜。⁶¹ 雖然光緒皇帝得知後仍極力建議醇親王應繼續服用徐延祚藥方，並請翁同龢轉達。然而，在轉達上意過程中，奕譞卻只回一句：「徐方實亦未見效。」⁶² 自此以後，《日記》

55 〈鐵如意軒寓〉，《大公報》（天津，1910年5月26日）。

56 有關徐氏醫著評論，可參朱鵬舉等，〈《醫粹精言》文獻學初考〉，頁160-162、173；王全利，〈《醫醫瑣言》價值再評價〉，頁252-253。

57 趙中孚編，《翁同龢日記排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冊3，頁1512，光緒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58 《醫粹精言》，楊錫霖序，光緒二十二年二月。記：「徐氏……堂開思半，延名流而會講。職供醫院，應列星而為郎。」可見徐延祚曾任職於太醫院。

59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冊3，頁1272，光緒十年二月十七日。

60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冊3，頁1512，光緒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61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冊3，頁1514，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是日所記云：「十四日，……醇邸服徐延祚方，左腿略動轉。昨用鹿茸沖酒，中旨不令服，大約御醫輩有先入之言也。奈何！奈何！」。

62 《日記》載：「十五日，……已正入，上曰：徐某方有效，而因用鹿茸沖酒，不令診脈矣。此何也？臣未對。上又曰：余意仍服徐方耳。又問，今日往問候耶？臣對無事不往。上曰：明日可一往。」次日午後翁往銜命往醇親王府探問並傳上意。《記》云：「邸目光尚好，語音微，舌屢捲，唇微笑。神氣如常而瘦甚矣。手指略動，不能拳，腿不能動。問近來漸好否？服何人藥好？曰：吾竟不知誰好。問能睡否？曰：略睡。問能吃盞飯（湯飯）否？略吃，不多。今

也未見有相關紀錄。

從徐延祚治療奕譞事件，可以看出由於慈禧太后聽信宮中御醫對徐延祚的批評，以致下旨中止治療。雖然光緒帝反對，並請翁同龢轉達，但醇親王畢竟是聰明人，太后懿旨違抗不得，即使心裡肯定徐的醫術，也只能口是心非否定了徐的藥效，甚至連同凌紱曾所開的代茶飲藥方也一併否定。⁶³

《翁同龢日記》描寫下的徐延祚，其人醫術雖佳，卻因個性率直，自不免容易得罪他人；也因為他自恃醫術高明，更容易受人忌妒詆毀。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爆發，徐氏眼看政局敗壞，曾上書萬言，建議改革神機營、海軍衙門與提督衙門等機關，終被朝廷否決。遂在次年毅然離開北京，遠赴廣東。

關於徐氏離京背景，翰林院庶吉士楊錫霖在徐著《醫粹精言》〈序〉中道出原委：

吾友徐子齡臣，少業儒，好經濟書，詩文有奇氣。一不得志於有司，遂棄去，走京師，以醫名一時。……往歲中日措釁，齡臣乃謂然曰，大丈夫不能為國家鍼膏肓，起廢疾，化弱而為強，區區以醫名，非國手也。於是上書當路，言和戰利病，近萬言，凡三上終不見用，遂下津門。⁶⁴

離開北京的徐延祚，彷彿拋開了官場枷鎖，開展其遊學之旅。首下天津，經山東至浙江、福建，而最後抵廣東。在友人史支源的挽留下，自光緒二十一年起在廣州暫居，開始著手《醫粹精言》的編纂工作；另一方面創設醫館，取名「鐵如意軒」，積極推動醫療與教育事業，⁶⁵ 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始北返移居天津。

日走動否？頃奏動，亦不暢。不意一病至此，前者幾殆，今略轉，因微笑。因傳上意，請斟酌服藥，總以得力這常服，不必拘。徐方實亦未見有效，至凌紱曾等所開代茶飲亦賴得吃。惟人乳得吃即好，明日回奏，可云當斟酌服藥，請勿愴記。」見《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冊3，頁1514-1515，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十五、十六日。

63 關於此事，徐延祚在他《醫粹精言》中亦皆述及。卷1，頁39a，〈扶陽〉條內記云：「比歲冬初，請醇邸脈。余用桂枝，諸醫皆為不宜。後服至十數劑，劑劑皆有桂枝，並用附子等，連服多日，精神飲食安寐俱見起色。……俗醫不知，偏用滋陰蠻補之味，以致藥日投而病愈重，不知早為變遷。誠可謂下愚不移也。」又卷2，頁10b-11a，〈治不必顧忌〉條云：「比年醇邸病，……群醫束手之際，而子診用通調陽氣之藥，不十數劑，王之病自是漸有轉機矣。後因用鹿茸以通督脈之法，而我皇太后以鹿茸性熱，恐與病又碍，傳旨停止。蓋自是而醇邸亦便不服他醫之藥矣。」

64 〈楊錫霖序〉（光緒二十二年二月），收入（清）徐延祚，《醫粹精言》，頁1a-2b。

65 〈鐵如意軒診例小引〉，《大公報》（天津，1907年10月6日）。〈小引〉中徐延祚記述其在廣州的經歷：「乙未（光緒二十一年，1895）遊粵，目擊羊城醫學淆亂，曾撰《醫粹精言》等書四種，分贈同人。三數年間，嶺南學者多所精進。」

由於目前尚未見相關文獻資料描述徐氏初抵天津時的活動情況，或許他仍以「鐵如意軒」繼續從事行醫工作，或從 1903 在《大公報》刊登「藥到春回」廣告，推測他持續致力於良方丹藥的研究。在「藥到春回」廣告中記載了徐氏自創各種應手丹丸達十五種之多。⁶⁶ 隨著 1902 年 6 月《大公報》的創辦，徐延祚的活動透過新聞報導開始有了具體的紀錄。該報除陸續刊載 1902 年間徐氏多篇針對時局疫情的醫學專欄外，尚包括徐延祚 1902 年 8 月登載「開演醫宗」演說告示⁶⁷；又在 1903 年 3 月間在天津東門冰窖胡同「鐵如意軒」館內開設「華醫學堂」廣告，期能造就專門醫學人材，扶植中國醫學。⁶⁸ 晚近學者即指出，「華醫學堂」是近代最早出現的民間新式醫學堂。⁶⁹ 後更在同年 10 月徐延祚將籌辦「天津醫學館」，並擬定學館章程八條呈稟地方督憲批核。⁷⁰ 此計劃似乎最後並未施行，或許與當年底徐延祚受署兩江總督周馥（1837-1921）邀請，前赴蘇州協助籌設醫學堂之故，遂不得不結束 6 年的天津生活。

周馥在蘇州省垣興建醫學堂，據《申報》報導看來是一所結合中西醫學的新式學堂。自開辦後，規模逐漸確立，並進一步計劃考派學生出洋，研習西方內、外科醫學，作為培育該省未來改良醫學的師範人材。⁷¹ 1905 年底，周馥為了酬謝徐氏的協助，遂向朝廷推薦其出任江蘇知縣。⁷² 然而，畢竟由於徐氏個性使然，始終無法適合官場生態，出任知縣不到兩年，即行請辭獲准。或許，對徐延祚而言，他的人生，更適合於從醫濟世。⁷³

1907 年 9 月，徐延祚重返天津，在津郡商紳的挽留下，再度以久違多年的「鐵

66 〈藥到春回〉，《大公報》（天津，此則廣告從 1903 年 6 月 14 日登載至 9 月 7 日）。廣告中共開列徐氏自製研創的丹丸，計有辟瘟丹、緩肝丸、德勝丹、小兒至聖保命丹、小兒定風珠、大活絡丹、龍虎丸、紫金膏、延壽膏、龜齡丸、守神丹、枇杷膏、煎煉十寶丹、小金丹、海上仙丹。其中部份名稱或可見諸傳統民間，部份或許來自徐氏原自宮中供職期間得來的藥方。

67 〈開演醫宗〉，《大公報》（天津，1902 年 8 月 23 日）。參與演說的除徐氏本人外，尚包括其門人張旭東、陳少林、張少謙、沈學曾等人。

68 〈華醫學堂廣告〉，《大公報》（天津，1903 年 3 月 15 日）。

69 路彩霞，〈清末京津唐醫問題初探〉，《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7 年 8 卷，頁 141。

70 〈督批照錄〉，《大公報》（天津，1902 年 10 月 22 日）。內載：「寓津醫士徐延祚稟。批：據悉籌辦天津醫學館所擬章程八條，是否可行？候行天津府籌核具覆。此批。」

71 〈札選出洋醫學生〉，《申報》（上海，1905 年 3 月 22 日）。

72 〈諭旨恭錄〉，《申報》（上海，1905 年 12 月 23 日）。據載：「十一月十三日（陽曆為 12 月 9 日）奉旨分發，……江蘇即用知縣吳盤年、徐延祚、吳孫惠，……俱著照例發往。」

73 有關徐氏辭職原委，1910 年 12 月 25 日《大公報》的一則廣告上有如下的記述：「歲乙巳（光緒三十一年，1905），以知縣聽鼓江南，慷慨躓直，不合時宜，遂絕意進取，大肆其力於醫，為拯救同胞之計。」見〈名醫回京〉，《大公報》（天津，1910 年 12 月 25 日）。

如意軒」名字重開醫館，又獲得當時天津商會總理王竹林與協理甯星普等人聲援並在報章上大力推薦。⁷⁴ 然而，相較於前次在天津積極推動醫學教育的徐延祚，這次舊地重返的徐氏似乎失去了當年的活力，僅僅堅守著「鐵如意軒」繼續實踐行醫救人事業。「不為良相，寧為良醫」，或許這是許延祚當時的內心寫照。

1910 年底，在北京友人敦請下，徐延祚開始規劃重返離開近十五年的京城。返京後的徐延祚，出任了京師內城官醫院醫長一職，⁷⁵ 並在京中開設「鐵如意軒醫院」，致力於貧民救治與京城預防醫療與防疫救治工作。專注於醫療救治事業，近七十歲高齡的徐延祚，竟在 1917 年 5 月 6 日下午因感時疫辭世，而當天早上，仍到院為病患診治。民國政府為表揚徐氏一生奉獻醫學，身後蕭條，經內務次長代理部長張志潭呈請給於撫卹。⁷⁶

(二) 白話名家：「敬慎醫室」丁國瑞

相對於徐延祚在宦海浮沉多年，津郡二進二出，丁國瑞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攜眷自北京移居天津後，直至去世皆在天津生活。丁國瑞一生事跡，主要在於：行醫、筆耕、演說、辦報、以及投入以醫濟世，籌辦學會發揮社會責任上。丁國瑞經歷著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與教育等各方面的變遷與衝擊，也深感國人必須力爭上游才能免於受外國人鄙視與欺凌的命運。因此，他的行醫，是以社會大眾為對象；他在筆耕與演說，辦報紙，皆以社會大眾易懂能讀的白話文體為宗旨；至於創辦學會，投身社會活動，則以振興傳統醫學，爭取國權為依歸。1924 年王寰如在《竹園叢話》第五集〈序〉中寫道：

竹園先生，為時下白話名家。當年所發行的《竹園白話報》及《民興報》、《天津白話報》裏邊，先生的著作真是不少。先生的文字，真可謂家諭戶曉，婦孺皆知。於國家應興應革，矯正社會風俗諸問題，言之尤為綦詳。……先生又是著名儒醫，故於醫藥衛生等，論之有益人生。⁷⁷

74 〈名醫留津〉，《大公報》（天津，1907 年 9 月 25 日）。當時聯名推薦的除王竹林、甯星普外，尚有金品三、王鼎臣、張勳帛、阮淑慶、鄭祥伯、聶偉臣、蔡殿卿、吳靜潭等人。

75 有關北京官醫院沿革的討論，可參見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 74；曹麗娟，〈清末北京首家官立醫院〉，《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7 年 10 月 28 卷 10 期，頁 58-60；杜麗紅，〈論近代北京公立醫療機構的演變〉，《北京社會科學》，2014 年 2 期，頁 74-80；丁芮，〈京師內、外城官醫院的醫療救濟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14 年 2 期，頁 81-87 等文。

76 《政府公報》命令，第 514 號，大總統指令第 1053 號令，1917 年 6 月 16 日。

77 王寰如，〈我讀了竹園先生叢話一二三四集以後〉，1924 年 4 月 1 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7 集，頁 8-9。

以白話文宣傳醫學，以白話文啟迪民智，以白話文辦報監督政府，丁國瑞在天津時期的生活，正是全力投注於提升醫學文化與社會教育的努力上。

丁國瑞，字子良，號竹園，回族人，原籍直隸宛平縣，世居北京德勝門外馬甸地方。⁷⁸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攜家帶眷移居天津。抵津初年，曾在當地正興德茶莊充任司帳，⁷⁹ 其後以早年學醫與習醫的經歷，在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宮西大馬路南口路東開辦「敬慎醫室」。不久將此址交兒子丁叔度經營，轉遷往法租界黎棧大安里內五十五號，同樣以「敬慎醫室」為名繼續行醫。⁸⁰

丁國瑞早年學醫，主要受叔父丁德恩（1854-1917）的影響。丁德恩在北京開設「德善醫室」，據《京城國醫譜》載他是當時北京的一位著名外科醫生。⁸¹ 從丁國瑞後來行醫也取「醫室」一名，看來確實秉持著早年家學的精神。丁國瑞兄弟四人，國瑞居長，次弟丁國珍（字寶臣，1875-1913），也曾習醫，1905年在北京創辦《正宗愛國報》。⁸² 另外兩位弟弟，一位丁子瑜，亦曾開辦《燕京報》，是一份回族宗教的報紙，餘一位則不得其詳。⁸³ 由此可見，丁國瑞四兄弟之中，三人皆曾投身於辦報行列。

丁國瑞一生筆耕不輟，論著豐富，有《說疫》、《治痢捷要》、《增補瘟疫》等醫學著作，而1923年開始陸續付梓出版的《竹園叢話》，更是集結了他626篇文稿，全書共24集，文體有雜談、諧談、演說、專論、醫案、醫方與寓言等，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健康飲食醫療衛生各方面。⁸⁴

除了撰文演說外，丁國瑞一生中在參與社會活動上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組織「天津醫藥研究會」、二是創辦「竹園白話報」，最後是成立「恢復禁煙主權會」。「醫藥研究會」原先名為「醫學研究會」，單純僅希望振興醫學教育為目的，其後有鑑於天津地區行醫者不識藥，販藥者不知醫，醫界與藥界兩者互不來往，更加上受

78 〈丁子良緊要聲明〉，《大公報》（天津，1928年7月11日）。聲明中丁國瑞對其出生有扼要的描述。

79 戶部健，〈北洋新政時期天津中醫界的改革活動與地域社會〉，頁150。

80 〈天津敬慎醫室丁叔度醫例〉、〈天津敬慎醫室丁子良診治簡章〉，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集，無頁碼。

81 張琴，〈秉承家學·懸壺濟世——記我國近代回族著名醫師丁竹園〉，頁56。

82 丁國珍在1906年在北京創辦《正宗愛國報》，以其筆峰犀利見稱，抨擊時政。然而在1913年因批露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與推行帝制的不法行為，被當局控以言論擾亂社會罪名，於當年8月19日遭殺害。見楊志平，〈近代回族報刊對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及其影響〉，頁82。

83 許憲隆，〈丁竹園愛國民主思想初探〉，頁56-57。

84 相關討論見丁宏，〈丁竹園與《竹園叢話》〉，頁76。

到東西洋醫學成藥漸次蠶食天津醫療市場的衝擊，遂決定擴大研究會的組織，謀求團結天津醫藥兩界，提振天津醫學知識與驗藥製藥之道。丁氏在光緒三十二年稟呈官方申請組織「醫藥研究會」的文稿內容中具體表達了他的想法：

為公同出資設立「醫藥研究會」，懇恩立案申詳事。竊維中國醫藥之學，不講已久，於體育衛生之道，頗有關係，而醫、藥隔閡之弊端，尤使病人受無形之害。……職等邀集同志，擬暫假西北隅馬路西閱報社為試辦處所。……醫生講習學問，互換智識，學問以外之事，概不談及。醫、藥二家，研究製藥，並使醫生習認藥材，將來辦有成效，籌有的款，再為擴充，或邀請通西醫之會友，將中西醫學互為匯通，或延精通化學之專家，研究驗藥製藥，以後如有改革更張之處，屆時再稟請核示。⁸⁵

稟稿上共同列名者除丁國瑞外，計包含當時天津醫藥兩界頗具影響力人士計十九人。此稟呈交天津縣署所得批示：「據稟：該職等公同捐資，創設醫藥研究會，推求醫學，改良製藥等情，具微立濟為懷，曷勝嘉佩，所訂章程，亦尚妥協，應准照辦，以收實效」；而呈至直隸提學司：「批閱來牘，所稱匯通中西醫理，研究製造藥材，皆屬切要之圖。本司樂觀其成焉。應准立案。此批。」在官方的肯定下，「醫藥研究會」終得獲准立案籌辦。⁸⁶此會的創辦，無疑對天津地區醫藥兩界同人給予了莫大鼓舞。依據該會章程，每星期固定開會研究，最初與會者雖僅約三十人，⁸⁷隨著研究會的運作漸入軌道，最盛時參與人數已多達八十餘人。⁸⁸

然好景不常，研究會的營運經費主要來自會員與外界贊助，但由於1911年6月天津發生金融危機，對天津實業界給予沉重打擊，導致一直支持研究會的有力人士紛紛因個人財務無力贊助，導致研究會經費中斷而停止營運。1912年夏天，又因會址樓下店舖大火被波及，會內場地與器具付之一炬，多年研究會活動不得不宣告結束。⁸⁹

85 〈天津醫藥研究會稟請提學憲及各憲立案稟稿〉，《天津商報》，第271號，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十七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0集，頁117-118。

86 〈天津醫藥研究會稟請提學憲及各憲立案稟稿〉，《天津商報》，第271號，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十七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0集，頁117-118。

87 〈再誌醫藥研究會（天津）〉，《天津商報》，第292號，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八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0集，頁120-121。

88 〈十誌醫藥研究會（天津）〉，《天津商報》，第348號，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5集，頁111-115。

89 〈丁子良之通告〉，《民興報》，第1135號，1912年5月13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8集，頁112-113。

籌辦《竹園白話報》，是丁氏生涯中另一項重要事業，受其弟丁國珍 1906 在北京開辦《正宗愛國報》的鼓舞，丁國瑞也隨於次年開辦《竹園白話報》。透過白話報章，達到啟迪社會民智，明瞭世局的目的。丁氏在 1907 年 9 月 10 日以向天津南段巡警總局申報的內容，作為該報代發刊辭：

竊惟報紙輔教育之不逮，通上下之隔闕，而白話報詞淺意顯，尤為啟蒙通俗之利器。查天津為水陸通商巨埠，人煙繁密，報紙雖有數種，而白話報尚付闕如。況預備立憲之廷諭屢頒，地方自治之規模粗具。奈國民程度尚淺，遇事動多扞格。設有白話報紙，日日開導鼓動於期間，使之明時局，知利害，導以安分勤業，勉其愛國忠君，閭閻日安。……今特出資設立《竹園白話報》館，實為開通風氣，維持治安起見。⁹⁰

白話報經當局核示「為廣開風氣，增益民智起見」，批准了丁氏設館的申請。此報發行後，由於文字淺顯易懂，廣受市場歡迎，銷量穩定，發行至 404 期，白話報又改名為《天津竹園報》。⁹¹ 我們無法得知丁氏將報名更改的理由，但更改後的《竹園報》數年後卻突然停版。據親友張際和指出，停版原因由於丁竹園受到其子猝然去世打擊而將報館關閉。⁹²

丁氏最後一項值得稱述的事業，是在 1910 年 11 月與劉孟揚（1877-1943）、顧叔度（1855-1915）等知名人士共同倡議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恢復禁煙主權會」，積極從事禁煙活動，力求朝廷爭取廢棄中英鴉片條約，恢復禁煙主權。在丁氏等人的鼓吹下，京津地區更成立了「中國國民禁煙會」，原「恢復禁煙主權會」更名為「中國國民禁煙會順直分會」。次年三月，以丁竹園等籌組「國民求廢煙約會」，推丁子良為代表，上書清廷外務部，強調廢約的重要性，並提出各種禁煙辦法，爭取當時政府機關的支持。⁹³ 此次活動中丁氏不僅提升了禁煙會的聲勢，也成功帶動往後國民禁煙意識抬升，充份發揮民間團體影響政府決策的角色。⁹⁴

90 〈天津南段巡警總局為出示曉諭事〉，《竹園白話報》，創刊號，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三日（1907 年 9 月 10 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 集，頁 130-132。

91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 集，〈說明〉，頁 2。

92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 集，〈天津張際和紹山甫序〉，民國 12 年 6 月，頁 1。序中描述：「咸誼丁君子良，經濟才也。隱於醫，日活人無算。……清季光緒三十三年八月，組織《竹園白話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冀以空言救國。……要不外乎監督政府，指導社會為天職。會以喪其長子，心緒惡劣，遽以停版，聞者惜之。」

93 〈代表上書情形〉，《大公報》（天津，1911 年 4 月 15 日），對當時代表上書並會晤外務部情形有簡要報導。

94 有關丁國瑞參與清末禁煙活動的討論，可參前引張琴、馬志俊，〈論近代回族社會活動家與民

然而，宣統三年（1911）以後，丁氏在社會活動的強勁力量開始轉弱，雖然仍可以在部份報章上看到他的論說，但相較晚清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是否與宣統三年（1911）初起因於《大公報》誤載消息造成天津中醫界名譽受損，丁氏據理辯誣進而引發中醫存廢問題的爭論事件，⁹⁵ 造成心理衝擊、鬥志消磨有關？或許尚須作細致的探討。⁹⁶

三、徐、丁兩氏的防疫宣傳與社會參與

在清末短短十年之間，中國經歷了兩場大瘟疫，作為重要通商口岸的天津，也在此兩次瘟疫大流行中無法置身事外。一方面由於交通運輸網的發達，雖加促了近代天津都市化的繁榮發展，而此外在背景又造成瘟疫爆發疫情快速擴張的推手；另一方面，由於晚清中國人缺乏近代衛生觀念，提供了疾病蔓延溫床，進而造成外國人對華人缺乏衛生習慣產生鄙視，當瘟疫發生之際，甚至對華人施以強蠻粗暴的檢疫與治疫作法，隨之引發一連串的民眾抗爭，中外衝突的情況。

面對這兩場瘟疫，醫士出身的徐延祚與丁國瑞，基於個人使命感與社會責任，分別以研擬藥方、發表演說、籌辦學會等方式投入社會防疫治疫宣導活動，致力教育民眾建立衛生觀念，加強人民對疫症的了解，並向政府獻策提出改善防疫措施，爭取中醫參與共同防疫工作。以下將以三個面向，逐次討論徐、丁兩氏推動社會防疫的努力。

（一）推廣良方，加強備疫成效

1902年5、6月間，正是天津處於霍亂疫情的高峰時期，徐延祚即把握著《大公報》6月中旬發刊時機，向天津民眾推薦了他的防疫藥丹「保命避瘟丹」，廣告內容寫道：「自去冬雪澤稀少，今春又雨水不調，天時忽寒忽暖，氣候誠屬不正。……況津地人煙稠密，氣息薰蒸，尤易感邪。……是以不忍坐視，遵《內經》

間禁煙運動——丁竹園及其組織化禁煙活動探析〉一文。

95 有關宣統三年以丁氏為首與《大公報》引發的中醫存廢問題爭議事件，見路彩霞，〈中醫存廢問題第一次大論爭——清末天津中醫與《大公報》筆戰事件考察〉一文；另余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一書第七章，〈晚清檢疫制度的引建及其權力關係〉，頁234-281亦有相關的討論。

96 例如丁國瑞在宣統三年四月二十日的一篇〈一誤豈堪再誤〉論說即曾表達了他的心情：「鄙人毫無學識，近來對於時事，已竟槁木成灰。所以二月間，連「醫藥研究會」的職任全辭退了。原打算不談時事，不談醫學。」見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1集，頁102。

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旨，特自創防疫保命避瘟丹一藥，以防未然。」⁹⁷ 透過廣告，向民眾宣達購備丹藥，預防病疫感染。廣告內並指示服用方式：「願慎身之士，於每早清晨，不拘老少，各吞服此避瘟丹一粒，用茅根湯下。……此為衛生第一妙法。」廣告中徐氏甚至擔心民眾懷疑他藉廣告謀利的意圖，最後寫道：「倘有疑余射利者，天地鬼神任受鑑察。」⁹⁸ 藉由道德保證，爭取消費民眾信任。此則廣告在《大公報》上連載了五天後即未再刊登，或許是發揮了一定功效或知名度。繼後每到季節交替之際，徐氏擔心時疫再度傳播，亦會適時在《大公報》上刊登防疫藥品廣告。⁹⁹

相對於徐氏 1902 年因應地方上霍亂流行高峰期即時行銷其防疫丹藥，丁國瑞這段時期卻未見具體活動。直到次年才刊出以「敬慎醫室經驗藥目」為標題廣告，向民眾推出一些簡單治疫藥丹。¹⁰⁰ 但在他編纂的《竹園叢話》裡，則收錄著他較早時期發表的「霍亂病」一文，內容主要針對感染霍亂患者提出的療法與藥方。丁氏建議患者一但感染霍亂，其「救急莫妙於刮沙」；並建議民眾日常須預購例如痧藥、八寶紅靈丹、御製辟瘟丹、周氏回生丹等成藥以備急需。¹⁰¹ 此外，在同書中也收錄一篇名為〈霍亂病治驗之討論〉，丁氏以其個人行醫經驗，治愈霍亂的案例，治療中除提到上述民眾應預購日常防疫丹藥外，更開出了一服〈服藥方〉，內有鮮蘆根、銀花、天花粉、連翹、滑石、鮮廣藿香葉、竹茹、薑川連、枳實、廣皮、知母、甘草、厚朴、木瓜等材料，用水煎服。丁氏後來將此案例與藥方在報章上公開，並請同道共同討論，俾能「以救民命，而為防疫之一助」。¹⁰²

雖然丁國瑞認為民眾預購治疫丹丸等成藥在備疫過程中有其必要性，但對於染疫者則強調使用合適且屢經試驗有效湯藥，才是根本的方法。例如在「濟世良方」中，開出了如「柳子厚鹹鹽吐法」、「郭右陶刮沙法」、「雞蛋清擦法」、「白礬救急方」以及「苧麥麵救急方」等，或內服，或外用，對於治療霍亂轉筋痧症有一定的

97 〈保命避瘟丹〉，《大公報》（天津，1902 年 6 月 21 日）。

98 〈保命避瘟丹〉，《大公報》（天津，1902 年 6 月 21 日）。

99 例如在《大公報》（天津），1903 年 3 月 29 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徐氏以其「鐵如意軒」之名刊登標題名為「防疫保命避瘟丹」的廣告；而至 6 月 14 日始，至 9 月 7 日止，繼以「藥到春回」標題，宣傳其「辟瘟丹」等各類型的防疫治疫丹丸。

100 〈敬慎醫室經驗藥目〉，《大公報》（天津，1903 年 4 月 18 日）。

101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 集，〈霍亂論〉，頁 122-124。

102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 集，〈霍亂病治驗之討論〉，頁 124-126。

功效。¹⁰³ 透過推廣有效應驗良方，以發揮一定的防疫效果。他進一步提醒，「以上各法，皆屢試屢驗，故敢傳佈。至於丸散湯藥，實不敢輕易下筆。皆因此症是寒是熱，非格外細心不能分辨」，更叮囑「以後各大君子，凡捨此等藥，須注意藥的性情，並云某症某症忌服。」¹⁰⁴ 丁國瑞一方面為民眾推廣防疫藥方，同時也考慮到病患體質差異避免服用後發生危險，誠可謂用心良苦。¹⁰⁵

宣統年間，面對東北肺鼠疫傳播造成天津社會人心惶惶。宣統三年（1911）正月初七日，丁國瑞當時即致函《民興報》，嘗試提出了一帖名為「牛犀飲」的藥方。方內寫出：真犀牛角、蒼朮、川連、淨黃土、芥菜葉等藥材，其中註明用藥份量，煎服方法，氣虛者加人參，結便者加大黃，口渴者加花粉等因應病患體質的不同藥材。但他最後仍強調：

此方，鄙人於去臘即欲抄傳，深恐與東省之現病不合，未便以懸揣而論斷也，致滋舛誤。今特錄出，以待高明之研究，未可即為定方也。¹⁰⁶

面對疫情，丁氏懷抱著以醫濟世的熱情，隨後又分別在《正宗愛國報》與《民興報》進一步提出防疫良法，如清淡飲食，隨身佩帶藥囊，臨近病人以囊堵口鼻；並建議民眾加強家中水缸施藥過濾，以殺蟲免疫；午後或晚間取食生蘿蔔與沏茶，可發揮消疫效果；防疫藥方如服用桑菊飲、銀翹散、清瘟解毒湯或犀角地黃湯諸方。至於針對病患，當疫症初起，先後使用刮沙與放血方法，也有救急的功效。¹⁰⁷

丁國瑞傳播治疫藥方與防疫方法，確實引起其他同道中人認同並提出交換意見的聲音。例如宣統三年正月初十日《民興報》登載天津呂壽山與陳少林兩位醫士來函，描述其家鄉南皮縣同樣受到東北疫情衝擊，死亡甚重，群醫束手。因見丁國瑞論說，肯定其防疫之道。兩人去函寫道：「貴報登載子良先生所錄生犀飲，實屬有功於世。……瘟疫之來，傳染之速，間不容髮，延醫服藥，往往不及施捨，而病已劇、命已廢。故敝見與其趨救於病已發之際，莫說綢繆於病未發之前。」兩人也提供了《清瘟解毒活血滋陰》防疫一方，希望登報，廣為流傳。此則報導，丁國瑞不

103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集，〈濟世良方〉，頁127-128。

104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6集，〈再說霍亂病〉，頁121。

105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6集，〈個人防疫法〉，頁123。誠如丁氏所言：「鄙人在醫言醫，對於社會，不能不勉盡一方責任。」

106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1集，〈致民興報館函〉，頁97。

107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7集，〈防疫之一助〉，頁118-119；第11集，〈對於外人防疫煩苛之感言〉，頁45-46。

僅看到，甚至也收入他《竹園叢話》裡。¹⁰⁸

地方瘟疫的爆發，是官民共同面對的社會危機，專家醫士個人的努力，不僅為下層民眾提供救濟的方法，但也因為仁人志士的帶動，激盪出其他同道中也投入濟世行列。丁國瑞的努力，無疑發揮了一定效果。另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丁氏在推廣他的防疫藥方，雖然也有一般大眾使用的成藥，但大多以生藥材料為主，從中不僅與他重視中國醫藥的主張不謀而合，也反映他宣傳藥方重點在社會公益的本意。¹⁰⁹

（二）發表論說，向政府社會建言

1902年霍亂大流行期間，天津《大公報》也登載了若干篇來自京津醫士對霍亂病症的專論，可見當時瘟疫的蔓延引發社會上相當程度的關注，也體現出各疫區社會人士以其個人專業提供不同方面的貢獻。¹¹⁰ 同樣，徐延祚除了透過《大公報》登出治疫丹藥的廣告外，並發表了他對霍亂病症的看法。在一篇題為〈霍亂考〉的文章中，考訂霍亂一詞的來源，並認為霍亂的流行，是來自於民眾飲食過度傷身所致。¹¹¹ 徐氏論說中，可以看出徐氏受到傳統醫學知識影響，將傳統霍亂與時下霍亂流行病疫混為一談，隨之引起了讀者投書反駁。¹¹² 但我們還必須體會徐氏發表此一論說目的，他嘗試從傳統醫學提供民眾對病疫基本知識，希望能紓緩社會民眾不安情緒，而他所指出預防感染霍亂，必須對飲食作有限度的節制觀念上，仍是有其正面的宣導教育效果。¹¹³

此外，徐延祚「鐵如意軒」門人張少謙，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用痧藥宜先辨痧證說〉，希望擬清其師徐氏〈霍亂考〉一文未涉及民間傳統對「痧」

108〈中醫呂壽山、陳少林來函〉，《民興報》（天津），第685號，宣統三年正月初十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8集，頁109-112。

109黃克武對上海《申報》醫藥廣告的研究中，即指出許多廣告藥品多以成藥為主，這背後隱藏著供應者操控商品價格的空間，從中適可反映成藥與生藥在市場流通本質性的差益。參見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7期下冊（1988.12），頁153。

110例如來自北京李蔭齋所寫的〈霍亂症預防法〉，以及天津徵信堂郭方齋的〈時疫緣起治法說〉。兩篇專文分別見《大公報》（天津），1902年7月21日與1902年7月13日論說。

111徐延祚，〈霍亂考〉，〈霍亂考續前稿〉，《大公報》（天津，1902年7月29日、1907年7月30日）。

112執兩端居士，〈霍亂考書後〉，《大公報》（天津，1902年8月28日）。

113單麗，〈清代霍亂病因認知（1820-1911）——以中醫和地方文化為中心的考察〉，《地方文化史研究》，2014年6期，頁10。

症的討論。傳統中國醫學上對痧與瘟疫在定義與名稱上經常被混淆，¹¹⁴張少謙的用意，是向社會大眾或同道人士提醒治療痧與霍亂病症必須有細致的辨認，避免治療霍亂因用藥錯誤發生人命情況。¹¹⁵報章論說，隨著社會流傳達到一定的傳播效果，其報導也與時下民眾關切議題有一定的相關。徐氏與其門人或徐氏與其他同行的意見交流，利用報紙為平臺，加深民眾對流行時疫深入認識的資訊。

同樣，丁國瑞不僅出身醫學背景，也與報界具深厚的關係。他清楚了解到報紙媒體的功能，也因此強調白話寫作與白話辦報對啟發民眾知識的重要性，利用公開演說，將演說內容在報章發表以廣泛傳播。¹¹⁶面對時疫流行，丁氏不僅以其醫學專業論說，教導民眾防疫治疫的知識，更以其作為公眾知識份子的角色，對當局治疫措施提出種種不當的抨擊。

例如他在前述〈霍亂病〉一文中，深入論述霍亂病的成因、病象，提供療法與藥方，使民眾在面對惡疫蔓延威脅下，提供預防的方法。而他在〈再說霍亂病〉一文，除了再次陳述有關霍亂疫症既有的主張外，也提到政府防疫單位檢疫防疫的煩苛。文中指出：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四、五月間，津沽一帶疫癘大作。……這確是傳染的病，彼時天津尚未交還，外國人極肯虛衷，由紳士設立保衛醫院，請中國醫生按中法施治，全活的很多。聽說旅順、營口一帶，可就遠不如天津了。不但檢查煩苛，聽說常把未死的病人，硬用石灰面子給埋上，也有偶爾受熱，或感冒著一點小風寒，一帶病容，就指為瘟疫，輕者拋棄郊外。噯！這不霍亂病，簡直的是霍亂政嘔。¹¹⁷

丁透過論說文字直白而用詞尖銳，不僅使下層民眾產生共鳴，也對政府執行公權力提出不當的責難。

114 有關明清醫學對痧症的認識與演變，可參祝平一，〈瘟疫與社會：以清代痧症為例〉，收入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95-117。

115 鐵如意軒門人古吳張曾志少謙述稿，〈用痧藥宜先辨痧證說〉，〈用痧藥宜先辨痧證說續前稿〉，《大公報》（天津，1902年8月19日、1902年8月21日）。

116 李孝悌的研究也注意到丁國瑞推動白話教育對社會影響力。見氏著，《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8，二版），專刊67，頁73。

117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6集，〈再說霍亂病〉，頁116-117。丁國瑞在另一篇論說則引用南方檢疫引發悲劇的例子：「君不見壬寅年夏間，南省檢疫之事乎？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某大員之女，竟被逼剝衣檢驗，驗畢無疫，女羞憤跳江死，大員無如何）」見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3集，〈中國醫學問答外篇〉，頁112。

丁的論說，在面向社會民眾，帶著一種溫暖的善意，他關心瘟疫對人民造成的傷害；但當面向國家疫政當局，則表示嚴厲不妥協的態度，不容國家機構侵犯人民權益，更無法接受國家對西方文化的屈服與忍讓。這種立場在宣統年間東北肺鼠疫防疫期間越益明顯。他曾在〈個人防疫法〉一文中提到：

人民既遭兵燹之劫，復受水旱之苦，流離失所，轉填溝壑。若再加之以疫癘之災，真是無生活之希望矣。¹¹⁸

在肺鼠疫威脅期間，丁子良為民眾提出許多防疫治疫的建議，溫言相勸，推廣衛生教育。然而，隨著晚清外國勢力在華的擴張，中西衝突日益緊張，丁國瑞對政府激烈言論也日漸增溫。

丁指出，自東北鼠疫爆發，傳播到津，人心惶惶。國家政府為防疫借外債，撥鉅款，又斷絕交通，耗費購置外國藥粉藥水，更有焚燬房舍器具與染疫屍身，擾擾嚷嚷，此皆由於中國政府國權的喪失與外國人檢疫的苛政。然而，在防疫過程中，中醫被排斥在體制之外，國家在防疫權被外人操控，人民生靈塗炭，如此「一遇瘟疫，即事張惶，非圍禁，即棄置，是已病者萬無生理，未病者亦必遭劫。」最後感嘆道：「國不可不強，我於釀疫之鼠輩，又何責焉。」對檢疫防疫的情況，丁氏不諱言直斥政府比鼠疫更可怕，苛政猛於虎，正是當時他內心寫照。¹¹⁹

丁後來把這場世紀大鼠疫的經驗，並將他當時相關的論說，集結編纂了《說疫》一書，廣發流傳。¹²⁰ 書中總結了他對這次疫情的看法與建議：¹²¹

1. 確認瘟疫發生的原委與感染何種疾疫。
2. 主張地方自治，防疫檢疫歸地方主導，因地制宜，防止擾民。
3. 提出防疫三策。加強疫前預防，上策；防治兼施，臨時救急，中策；淨防不治，下策。
4. 改良防疫方法：中西醫分工，西醫檢疫，中醫防疫；善待病患；重新重視中醫療法。

118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6集，〈個人防疫法〉，頁123。

119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11集，〈對於外人防疫煩苛之感言〉，頁42-50。

120 丁國瑞，《疫說》，收入吳海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民國丁巳年鉛印本），科技類，第224冊，〈張際和序〉，頁6。

121 丁國瑞，《疫說》，頁29-57。

對丁氏而言，透過社會教育、國民教育，加強民眾衛生觀念是免疫之要旨。但在防疫，治疫過程中，當政者必須心存濟物，不能臨事張惶，一切委諸外國列強之手；而更重要是，中國醫學實具有防疫治疫的能力，但必須國內醫界團結，自力圖強，發揮傳統醫學精神，並取西醫之長，補己之短，才是中醫學界未來的出路。

（三）組織社團，提升中醫地位

清末時期，由於新風氣、新思潮的激盪，地方社團如閱報社、宣講所、講習會等如雨後春筍活躍起來，傳播新知，啟迪民智，砧斲時局，成為新時代的作風。¹²²同時也鼓動了地方士紳社會參與，加強社會秩序管理要求、國民意識深化與啟蒙教育活動的推廣各方面。¹²³

對丁、徐兩氏而言，受到當時社會風氣感染，眼看中醫地位一落千丈，所謂「救亡圖存」之心躍然而起，繼而積極籌組傳習所或研究會，期能振興中醫學傳統，發揮社會責任。

「邇來西醫日盛，中醫日衰」，這是清末《大公報》在宣統末年一則報導中對當時醫學界中西醫力量消長情況的一段描述。¹²⁴事實上，早上多年前，中醫士本身也深感這種情況的轉變，徐延祚即指出：

聞之陸宣公曰，不為良相，願為良醫。……夫良醫之療病也，與死生之權，操活人之術，手到春回，斡旋造化。……今津郡為萬國通商之總匯，而行道之士，較他處為多，欲求如陸宣公之所謂良醫者，實不可得。無怪乎西醫常詆華醫之不精於醫術，顛預從事，草菅人命。遺笑於西醫者，已有年矣。¹²⁵

這是 1902 年 9 月徐延祚在天津霍亂疫情消退不久，解釋其創立「開演學宗」醫學演說班的動機。而丁國瑞在 1906 年 10 月間的一次演說中，也是以同樣心情籌組「醫學研究會」。他說：

自環球交通之後，優勝劣敗之理，盡人皆知。就拿醫藥一節說罷，現在我們就算醒，在人家後頭了。其實還是連醒都沒醒，人家天天走，我們天天

122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頁 43-84。

123 吉澤誠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頁 4；8-18；385-388。吉澤即認為此四點正是標誌著天津近代的面向。

124〈研究志聞〉，《大公報》（天津，1911 年 2 月 14 日）。

125〈道異說〉、〈道異說續前稿〉，《大公報》（天津，1902 年 9 月 9 日、1902 年 9 月 10 日）。

睡，日久天長，咱們醫學藥業，決然站不住，非全歸人家的掌握不可。¹²⁶

徐、丁兩氏，是實際行動主義者，為了扭轉中醫學界積弱的局面，徐氏首先在 1902 年 8 月底《大公報》上刊登其將發起「開演醫宗」演說班。¹²⁷ 學者研究指出，這是近代中國最早的醫學改良活動。¹²⁸ 創立之初規劃每日中午十二時整點開始演說醫學精理，除徐氏外，並加上其門生張旭東、陳少林、張少謙，後來增加了沈學曾共同主持。可能是參與出席者有限，開班不久改為每月三、六、九日開講。雖然看似縮班，但也獲得社會少數同道的回響。¹²⁹

為了進一步貫徹其振興醫學的理念，次年徐氏將原先僅辦理演說班的計劃，在「鐵如意軒」館內擴大創辦「華醫學堂」，這是當時天津地區最早出現的民間新式醫學堂，而且入學不取分文。徐氏指出學堂創辦目的，是「一以為造就專門之醫學，一以為扶植華醫之道統」，「惟願中國多一精通明理之醫，於衛生之術不無少補。」這裡特別提到「衛生之術」，背後正顯示徐氏注重醫學與衛生的關係，也是他建立學堂，期能推動國人衛生教育的想法。報載此學堂正式訂於 3 月 29 日開課，時間為每日上午八點至中午十二點。¹³⁰ 雖然我們無法進一步獲得有關該學堂營運的更多訊息，但仍可領會到徐氏開辦演習班與學堂，投入天津醫學教育的用心。

丁國瑞籌辦「醫藥研究會」的立場無疑與徐延祚同樣是為求振興中醫學界，但其活動時間相對徐氏更長。有關「醫學研究會」的研究，日本學者戶部健已有較深的討論，¹³¹ 本節則主要針對該會在防疫活動與工作上加以論述。

「醫藥研究會」開始籌組於 1905 年秋，¹³² 而在次年 10 月 4 日經稟呈批准立案後開始展開正式活動。¹³³ 其中，在創會宗旨上第五條：「凡關於醫道藥業，有不妥善之事，本會有提倡改良之責任。……並發明衛生淺理，使社會間多數人默受其

126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0 集，〈在醫藥研究會第二次演說〉，頁 61。

127 〈開演醫宗〉，《大公報》（天津），1902 年 8 月 23 日。

128 路彩霞，〈清末京津庸醫問題初探〉，頁 143。

129 例如在開班過程，亦有醫學同道出席並進行交流討論。徐氏也將其討論對話內容，敷陳成文，先後在《大公報》上發表。如 1902 年 12 月 24 日刊登的〈中西醫理宜於參究論〉，以及 1903 年 3 月 1 日登載〈續道異說〉兩文。

130 〈華醫學堂廣告〉，《大公報》（天津，1903 年 3 月 15 日）。

131 戶部健，〈北洋新政時期天津中醫界的改革活動與地域社會〉，頁 149-162。

132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8 集，〈丁子良之通告〉，頁 112。

133 〈再誌醫藥研究會（天津）〉，《天津商報》，第 292 號，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八日（1906 年 10 月 4 日），收入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0 集，頁 120-121。

益，消患無形為緊要。」¹³⁴ 會議活動內容主要有演說、討論療法、分科研究以及實地研究、

其中，研究會除了對既有中國醫學的深化研究外，也鼓勵會友報告有關衛生教育與瘟疫知識方面新說。¹³⁵ 例如丁國瑞即曾在會中第三次會議上，就〈醫、藥、病三家之關係與責任〉為題進行演說，報告強調醫士對病家多灌輸衛生學的知識與道理，他認為：「歐美人不但講強國，而且講強種。」衛生學，對丁氏而言，無疑是強種、強國的基礎。¹³⁶ 而其他會友演說內容，如張宜閑的〈研究時疫之治法〉¹³⁷ 與〈現下疫症與古稱霍亂之異〉¹³⁸、岳蓮溪〈痧症治驗〉¹³⁹、馬治亭〈論疫痧〉¹⁴⁰，以及章敬奮的〈瘟疫論〉¹⁴¹ 等演說，則有助於加強會友對瘟疫知識的了解，以便行醫對症下藥，廣惠社會。

討論療法是會友間對治愈醫案的交流。分科研究方面，據研究會章程，該會共分十二科，計有稽古科、內科、外科、針灸科、婦女科、攷藥科、幼科、眼科、咽喉口齒科、救急雜症科、正骨科與求新科。其中，內科研究因涉及傷寒、溫病與瘟疫等內容，其正副科長共 8 人，而求新科中講習衛生理化的新式醫學，正副科長共 6 人。此兩科人數皆較他科僅 1 至 3 人為多，明顯體現出醫藥研究會對瘟疫治療與推廣衛生知識研究中西醫學並重的態度。¹⁴² 至於實地研究，則是安排在會議演說後，請出席會友就疑難病患進行現場集體診治。每次僅接受三位來診男性病患，透過共同診治討論方式，經彼此診治後各立藥方，互相研究討論，以提升會友診治問症的能力。¹⁴³

戶部健即認為，「醫藥研究會」經過多年努力，每週一次的研習活動，團結中醫學界的努力，深化中醫治療的效果，也加強對衛生與疫政的研究，最後推動了宣統二、三年間鼠疫流行時，津郡成立的「臨時防疫保衛醫院」。¹⁴⁴ 研究會成員多以

134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6 集，〈創議中醫研究會章程〉，頁 135。

135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7 集，〈創議中醫研究會章程（續）〉，頁 128。

136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3 集，〈在醫藥研究會第三次演說〉，頁 58。

137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3 集，〈社會要聞：七誌醫藥研究社〉，頁 119。

138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3 集，〈醫藥研究會紀聞〉，頁 114。

139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3 集，〈醫藥研究會紀聞〉，頁 114。

140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3 集，轉載馬治亭，〈論疫痧〉，頁 122-124。

141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3 集，轉載章敬奮，〈瘟疫論〉，頁 125-126。

142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3 集，〈天津醫藥研究會現行章程〉，頁 114-118。

143 丁國瑞，《竹園叢話》，第 13 集，〈天津醫藥研究會現行章程〉，頁 114-118。

144 戶部健，〈北洋新政時期天津中醫界的改革活動與地域社會〉，頁 153。

醫士為主體，但也有少量的商紳參與，例如天津商會的王竹林，甯星普即其中之一，當「臨時防疫保衛醫院」發起防疫工作，即延聘當地華醫參與，分班住院，¹⁴⁵而丁國瑞即位其中之一。《大公報》曾對此事進行了如下的報導：

（天津商會）總理王竹林觀察演說，略謂時疫盛行，設立保衛醫院，仍提用辛丑年本埠保衛醫院之餘款，作為開辦經費，用中法救治。又由醫士丁子良先生演說，略謂本會為保全治安，救治人命起見，凡得病之人，由調查員問其家屬願歸防疫會調治，或衛生局調治，或保衛醫院調治，聽其自便，儻有願在自家養治者，碍難聽從，蓋恐其傳染也。¹⁴⁶

事實上，當時丁國瑞除了參與保衛醫院的防疫工作外，也充當天津衛生局的防疫顧問，有關聘請華醫參與救治，也徵詢了他本人的意見。¹⁴⁷

丁氏對晚清地方醫療，透過籌辦社團，加強中國醫、藥兩界團結，積極參與當時社會防疫與治疫活動，在推動近代中國衛生教育付出許多心力。然而，由於他個人強烈維護中醫界的理念，極力抨擊國家政府與外人防疫工作的缺失，導致當時西醫體系的攻擊。在經歷了宣統初年與《大公報》的論戰後，心力交瘁下的丁國瑞開始淡出社團，加上多年經營的「醫藥研究會」在宣統三年一場大火燒燬後，更對丁國瑞造成沉重打擊。

結 論

本文主要以清末十年天津地區出現的兩場瘟疫，1902年霍亂大流行與1910至1911年東北肺鼠疫爆發對津郡構成的社會影響為主軸，以兩位出身醫士，同時又秉持振興中國醫學傳統的徐延祚與丁國瑞兩人為線索，探討兩人面對瘟疫威脅，國家積弱與外力衝擊下的處境與對策。

徐、丁兩氏以其身為醫士，肩負起社會救濟的責任，秉持以醫救人，也力圖能以醫濟世。他們皆親身經歷了這場近代瘟疫史上重要災難，並且以各自建立的「鐵如意軒」與「敬慎醫室」為基礎，在瘟疫蔓延中為民眾推廣防疫良方、發表論說以

145〈津商會為東三省鼠疫傳染津埠擬急立保衛醫院并按區段設董嚴加訪查事稟直督文〉，宣統三年正月十六、十八日（1911年2月14日、16日），收入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下冊，頁2164。

146〈照錄商會開議防疫詳情〉，《大公報》（天津，1911年2月11日）。

147〈防疫事彙誌〉，《大公報》（天津，1911年2月12日）。

及籌組社團學堂。兩人雖素未謀面，但理念卻如此類似，在濟世救人的背後中，是希望能振興傳統中醫，免於受外來醫學的衝擊。然而也將可以發現，在個人的際遇、社會變遷加上外力衝擊下，也讓他們浮沈不定。在堅持信念過程中，也付出相當代價。徐延祚一生致力防疫治疫工作最終卻感疫身亡，丁國瑞為維護中醫最終在飽受西醫界輿論壓力攻擊下選擇了低調隱退。

有關以往對徐、丁兩氏的研究，大多以個人傳記式的描述，較少將兩人放在時代與社會背景下進行觀察。透過本文的探討，徐延祚雖然由擁有御醫的背景，但他並未能適應官場生態，直率的個性最後使他不得不放棄為官之道，專注投入行醫濟世的事業，他雖然擁有廣泛的社會人脈關係，但也卻很少利用，晚年靜靜在北京一所濟貧官醫院中為貧民診治。至於丁國瑞似乎同樣也具有徐延祚坦率的個性，不平則鳴，勇於任事。這使他獲得不少掌聲，但也為他樹立不少潛在敵人。他在《竹園叢話》一書以及《大公報》收錄許多與同行相互論辯的紀錄與報導。然而，明顯地，兩人皆是在面對中醫日趨式微下繼而奮起為維護傳統付出心力。羅芙芸研究認為，丁國瑞在宣傳他「自認為」的衛生觀念，卻並非渴望如其他同樣的衛生近代化。¹⁴⁸ 然而，當我們更仔細的爬梳丁國瑞的論著，他也並不是一個僅僅抱守傳統醫學的大夫。丁國瑞後來沉重的指出：

保守中國防疫的自主權，挽回中國土產藥材已失的利權。勿誣我為不滿意防疫，我實為愛惜西學之名譽，以求改良辦法，促使其臻於至美至善之地位也；更勿誣我為輕視西醫學也，余若輕視西醫學，則絕不令二小兒肆業於京師國立醫學專門學校。¹⁴⁹

瘟疫的出現，似乎在當時中國城市衛生惡劣條件下並不稀有，新細菌的入侵也並非中醫無法克服。根本上，徐、丁兩人本於愛國情懷，在面對利權、防疫權、國權甚至外人的強權下，作出了他們的肆應對策。本文藉由兩位歷史人物的探討，或許折射出近代中國，同樣懷抱著愛國熱忱的許多知識份子，各自皆有內心的掙扎與面對現實社會的逼迫。

148 羅芙芸，《衛生的現代性》，頁 259。

149 丁國瑞，《說疫》，〈覆某醫駁疫之平議〉，頁 135。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清)王錫彤撰，鄭永福、呂美頤點注，《抑齋自敘》，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 (清)徐延祚，《醫粹精言》，收入陳建華主編，《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年，冊366，輯44，子部醫家類，冊5。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鐵如意軒刻本影印。
- (清)張燾，《津門雜記》，收入《叢書集成三編》，臺北：臺新文豐出版社，1997，冊73。
- 丁國瑞，《竹園叢話》，民國十二年天津敬慎醫室鉛印本。收入吳海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0-128冊。
- 丁國瑞，《疫說》，收入吳海鷹主編，《回族典藏全書》，冊224，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民國丁巳年鉛印本。
-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錫良遺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
- 趙中孚編，《翁同龢日記排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宮中檔光緒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天津市檔案館等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 《大公報》(天津)。
- 《申報》(上海)。
- 《盛京時報》(奉天)。
- 《政府公報》命令，第514號，大總統指令第1053號令，1917年6月16日。

近代論著

- 丁宏，〈丁竹園與《竹園叢話》〉，《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頁78-81。
- 丁芮，〈京師內、外城官醫院的醫療救濟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14年2期，頁81-87。
- 戶部健，〈北洋新政時期天津中醫界的改革活動與地域社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7年8期，頁149-162。
- 王全利，〈《醫醫瑣言》價值再評價〉，《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14年5月38卷3期，頁252-253。
- 王銀，〈1910-1911年東北鼠疫及防治研究〉，江蘇：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5。
- 朱鵬舉、傅海燕、趙明山，〈《醫粹精言》文獻學初考〉，《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16年2月22卷2期，頁160-162、173。
- 朱鵬舉、傅海燕、趙明山，〈清末民初醫家徐延祚其人其書考〉，《浙江中醫雜誌》，2016年3月51卷3期，頁218-220。
- 余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 呂凌，〈清代遼寧地區代表性醫家考略〉，《中醫文獻雜誌》，2017年2期，頁46-51。
- 李文波編，《中國傳染病史料》，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
-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專刊6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8，二版。
- 李廣誠，〈撲滅中國北方之瘟疫〉，《東方雜誌》，8卷8號，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頁3-8。
- 杜山佳，〈萬國防疫會記〉，《東方雜誌》，8卷3號，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頁15-29。
- 杜麗紅，〈論近代北京公立醫療機構的演變〉，《北京社會科學》，2014年2期，頁74-80。
- 岳謙厚、喬傲龍、劉紅彥，〈清光緒二十八年天津霍亂防治——《大公報》有關此次疫情及防疫報導之研究〉，《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6期，頁48-53、69。
- 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流行——上海、東北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02-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1期，2006年3月，頁91-129。
- 胡勇，〈清末瘟疫與民眾心態〉，《史學月刊》，2003年10期，頁73-78。
- 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 張海榮，〈清末天津衛生事業的發展與市民衛生觀的初步確立——以《大公報》為中心的考察〉，《城市史研究》，2014年2期，頁52-72。
- 張琴，〈秉承家學 懸壺濟世——記我國近代回族著名醫師丁竹園〉，《中國穆斯林》，2010年2期，頁56-57。
- 張琴，〈晚清回族知識份子丁竹園愛國主義思想評議〉，《民族藝林》，2014年1期，頁48-52。
- 張琴、王晶，〈近代回族報人丁竹園的職業觀及其社會實踐研究〉，《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3月27卷2期，頁79-82。
- 張琴、馬志俊，〈近代回族社會活動家丁竹園及其禁煙活動述略〉，《蘭臺世界》，2012年33期，頁80-81。
- 張琴、馬志俊，〈論近代回族社會活動家與民間禁煙運動——丁竹園及其組織化禁煙活動探析〉，《石河子大學學報》，2016年12月26卷6期，頁108-112。
- 曹瑛，〈清末遼寧籍醫家徐延祚及其醫學貢獻〉，《中醫文獻雜誌》，2010年3期，頁46-48。
- 曹麗娟，〈清末北京首家官立醫院〉，《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7年10月28卷10期，頁58-60。
- 許憲隆，〈丁竹園愛國民主思想初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3期，頁54-57。
- 單麗，〈1902年霍亂在中國的流行〉，山東：中國海洋大學碩士論文，2008。
- 單麗，〈從1902年霍亂傳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10月26卷4輯，頁55-65。

- 單麗，〈1902年中國南方霍亂的海路港口傳入與內陸蔓延〉，《國家航海》，2012年1期，頁38-49。
- 單麗，〈清代霍亂病因認知（1820-1911）——以中醫和地方文化為中心的考察〉，《地方文化史研究》，2014年6期，頁1-10。
- 程愷禮（Kerrie L. MacPherson），〈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收入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下冊，頁747-795。
- 程龍，〈《大公報》1902年瘟疫報導研究分析〉，《東南傳媒》，2008年1期，頁86。
- 費克光（Carney T. Fisher），〈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收入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下冊，頁673-745。
- 馮志陽，〈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衛生觀念——以《大公報》對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史林》，2006年6期，頁96-103。
-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7期，下冊，1988年12月，頁141-194。
- 楊志平，〈近代回族報刊對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及其影響〉，《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4期，頁81-87。
- 路彩霞，〈中醫存廢問題第一次大論爭——清末天津中醫與《大公報》筆戰事件考察〉，收入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與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216-233。
- 路彩霞，〈年中度歲與晚清避疫——以光緒二十八年為主的考察〉，《史林》，2008年5期，頁90-95。
- 路彩霞，〈清末京津庸醫問題初探〉，《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7年8卷，頁128-148。
- 鄧華，〈對丁竹園教育思想的認識〉，《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15年2月31卷1期，頁87-93。
- 鍾銀梅，〈救濟蒼生·矢志不渝——丁竹園濟世救亡理念探析〉，《回族研究》，2011年2期，頁80-86。
- 羅芙芸（Ruth Rogaski），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 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
- 吉澤誠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 Lei, Sean Hsiang-lin（雷祥麟）.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Benedict, Coral.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pidemic Control by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Tianjin Physicians in the Late Qing: Using the Iron *Ruyi* Hall and Prudence Health Clinic as Example

Cheng, Wing-cheong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Around the latter part of the Guanxu reign (1875-1908)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Tianjin area witnessed epidemics of the plague and cholera. Due to poor personal hygiene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area and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ir control, such as seasonal changes in their environment, contagious diseases quickly spread there and led to considerable loss of life.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a weak government, economic hardship, and interference from foreign powers, local gentry in the Tianjin area joined together to work in epidemic control and teaching about personal hygiene. From the materials surviving today, records left of the Iron *Ruyi* Hall (Tie ruyi xuan) opened by the local physician Xu Yanzuo and the Prudence Health Clinic (Jingshen yishi) established by the doctor Ding Guorui reveal greater information. They show that when people in the Tianjin area faced disastrous epidemics during the late Qing era, local gentry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lead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reorganization, educating the people, and providing local health service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of which deals with the cholera epidemic of 1902 and the plague of 1910 which struck Tianjin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delving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ianjin epidemics on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the study then addresses related research on hand combined with other local Tianjin information, such as literary collections and notes, gazetteers, and locally published newspapers, to introduce the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medical experience of two figures, Xu Yanzuo and Ding Guorui, who were prominent during these two epidemics. Finall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ir activities in epidemic control and educating the people,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foreign powers,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national and local society as seen in Tianjin at this time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and important epidemic control measures taken by local physicians.

Keywords: Late Qing, Tianjin, physician, Xu Yanzuo, Ding Guorui, Iron *Ruyi* Hall, Prudence Health Clinic, epidemic control, cholera, plagu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